

實用智慧叢書

中國家訓智慧

汪維玲 著
王定祥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
G7

16

1

实用智慧丛书

金良年主编

中国家训智慧

汪维玲 王定祥著

上海书店出版社

实用智慧丛书
中国家训智慧

汪维玲 王定祥著

*

香港中华书局出版
上海书店出版社重印
(上海福州路 401 号)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吴县文化印刷厂印刷

*

787 × 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6 字数 90 千字

1993 年 10 月第一版 1993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0001-3000

ISBN 7-80569-724-8 / B · 49

定价: 5.00 元

沪新登字 119 号

目 錄

一、德爲教育之本

1. 致知格物 誠意正心 1
2. 修身爲本 14
3. 人之初 性本善 27
4. 胎教 38

二、家庭教育

1. 育善在家 47
2. 身自爲率 54
3. 寓慈於嚴 64

4.	先教後罰	74
5.	愛子貴均	86

三 行爲中的道德

1.	以小見大	97
2.	慎獨	102
3.	勤勉	110
4.	三人行 必有我師	122
5.	以謙和待人接物	134

四 生活中的教育

1.	重儀容	141
2.	戒奢侈	149
3.	戒食欲	162
4.	敬尊長	175

一、德爲教育之本

1. 致知格物，誠意正心

「子女教育是社會的基礎。」（柏拉圖）「現今的父母教育子女，就是締造我國未來的歷史，因而也是締造世界的歷史。」（馬卡連柯）這兩段話分別出自相隔二千多年兩位經歷完全不同、志趣各異的名人之口。前者是古希臘著名的哲人，睿智的思想家。後者是蘇聯現代傑出的教育家，也是作家。他們的話從兩個不同的側面揭示了子女教育的根本意義。

千百年來，在家庭教育中應當循行什麼樣的原則，教育的基本點又是什麼，一直是父母們以至社會極爲關心的問題。

明末清初的大學者孫奇逢在《孝友堂家訓》中說得很明白：「教家立範，品行爲先。」意即進行家庭教育，樹立風範，應首先從品德操行人手。這個觀點無疑是正確的。但這種家庭教育觀並不是始於孫氏的。華夏之族崇尚德行的意識歷久彌遠，在先秦典籍裏有許多關於「德」的記述。比如《書·堯典》稱頌上古聖帝堯，說他「功業廣大無所不至，端肅有禮清明治世，文章氣勢浩蕩而含義深遠，德行美好而出乎自然，誠信謙恭能行禪讓（主動把帝位禮讓給舜）」。他的高尚人格、偉大業績，輝煌如日照耀天地四方。指出堯是通過「克明俊德，以親九族」，「平章百姓」，「協和萬邦」，把嘉德美行由自身發揚光大起來，推及家庭、親族、邦國以至天下，使得四海之內和睦，黎民百姓樂善，達到和諧大同的境界。《詩》三百零五篇，其中《周頌》、《魯頌》、《商頌》四十篇及部分《雅》詩都是歌功頌德的作品。像《文王》：「穆穆文王，於緝熙敬止。」「亶亶文王，令聞不已。」就是寫周文王品性行止端莊恭敬，謹慎善良，心地光明，勤勉治國，美名四方傳揚。但是，《詩》中也有不少諷刺、揭露王公貴族醜行敗德的篇章，分佈在十五《國風》及一些《雅》詩中。如《新召》、《南山》分別斥責衛宣公霸佔兒媳，齊襄公私通胞妹的亂倫行爲；



《株林》嘲諷陳靈公與夏姬的淫亂；《賓之初筵》昭示貴族飲酒無度、失儀敗德的行爲等等。

先秦的其他典籍如《易》、《禮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、《韓非子》等都不不同程度地談到「德」的問題，作過不盡相同敘述。

所謂「德」，這個字在古代中國語裏被賦有多種含義。但它的基本含義就是現代人所說的「道德」。它是人的一切美好品行的概稱。古人大致歸結爲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、忠、恕、孝、悌等等。其中，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，又稱作「五常」之德，封建在古時被奉爲人性之綱；孝、悌、忠、信，儒家視之爲「四德」。「仁」，作爲道德觀念，基本特徵是指人與人相親、愛人，也就是所謂「愛之理」。「義」，即「事之宜」，或者說是合理、適宜的事。「禮」，是規定社會行爲的法則、規範、儀式的總稱。「智」，指聰明、才能。「信」是誠實不欺。「孝」即敬事父母雙親。「悌」，指弟敬順兄，係兄弟友愛之道。盡心竭力爲國家或爲他人辦事叫作「忠」。胸次寬廣容人容事稱爲「恕」。

道德作爲維繫人與人之間社會關係的行爲準則，具有重要作用，從大處

說，關係到國家民族的精神風貌和安危興衰；從小處看，涉及個人的品行修養與成敗得失。古今人們對此都很重視。

孔子曾提出「德治」的主張，認為治理國家只靠政令和刑罰不是好辦法，而應當使用道德教化和禮儀整飭的方式。因為前者使百姓有畏懼感而無羞惡心，有了罪錯只是設法逃避刑罰，沒有真心改惡從善。後者「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」。百姓受到感化，萌生羞惡之心，「有恥且格」，就可以自我糾正，避免不良行為的發生。即使有所過失，當會自悔自責，很快改正。

在古代家教中，品德教育居於首要地位。古人認為，一個人想要養成美好的品德，需從「致知格物，誠意正心」入手。

《禮·大學》云：「致知在格物，物格而後知至，知至而後意誠，意誠而後心正。」

「致知格物」說的是明理的過程。關於這一點，前人解釋不盡一致。漢代鄭玄「以格為策」，認為：「致知格物」即接觸事物獲得知識。北宋司馬光則說：「《大學》曰：『致知在格物』。格，猶扞也，禦也。能扞禦外物，然後能知至道矣。鄭氏『以格為來』，或者猶未盡古人之意乎！」他的意思是：人

072661

能够抵禦外來物俗的誘惑，然後才能「致知」，達到「能知至道」的境界。之後，著名理學家程顥、程頤，朱熹又各抒見解。二程說：「格猶窮也，物猶理也，猶曰窮其理而已矣。」窮理又是多方面的：「或讀書講明義理；或論古今人物，別其是非；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，皆窮理也。」朱熹在二程的觀點上加以補充說：「致，推極也。知，猶識也。推極吾之知識，欲其所知無不盡也。」「格，至也。物，猶事也。窮至事物之理，欲其極處無不到也。」程、朱所說的基本意思相近，意即要分析事物，窮根究底，然後才能獲得知識。上述幾種說法儘管立足點不同，側重面相異，但實質是從不同角度來說明明理的途徑。一個人想要正確了解事物，明辨是非，當然不能讓自己的思想爲物質的利誘所蒙蔽；在接觸事物時，應當而且也會運用自己已有的知識去判斷、分析；如果只是浮光掠影，對事物也就達不到真正認識的地步，因此必須尋根究底，探求事理。惟有這樣，才能全面、準確地把握事物，才可能明瞭道德之至善的所在。

「誠意正心」，是在「格物」「致知」基礎上立德的基本方式和途徑。《禮·樂記》說：「著誠去僞，禮之經也。」意謂：使人的意念誠實，摒除虛

偽，是（作爲規範的）禮的基本法則。司馬光在他的《遼書·三欺》中寫道：「君子所以感人者，其惟誠乎？欺人者不旋踵，人必知之；感人者益之，而人益信之。」這是說，君子取信於人靠的是真誠，欺騙是長不了的。對人保持真誠的人，人們對他就會加深信任。他又說：「《中庸》所謂『誠者，天之道』，言聰明睿智，天所賦也。『誠之者，人之道』，言好學從諫，人所爲也。」這段話意爲：人們聰明智慧是天賦的，但人不能成材，則在於好學從諫，這是後天人爲努力的結果。誠實不欺，誠心好學，擇善而從，博學之，審問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篤行之，這是「賢人」成材的重要條件，也是凡人「求益」的重要方面。

古人認爲，心是人身的主宰，是思維和精神活動的發源地及活動場所。

《素問·靈蘭秘典論》說：「心者，君主之官也，神明出焉。」《靈樞·邪客》言：「心者，五臟六腑之大主也，精神所舍也。」徐大椿《醫學源流論》解釋說：「心爲一身之主，臟腑百骸皆聽命於心，故爲君主，心藏神，故爲神明之用。」鑒於「心」的地位如此重要，「正心」的必要也就不言而喻。道理很簡單：倘若作爲中樞的心不正，或者說邪僻，那麼就難以指望人的思想、行爲走

在正路上。「立德」也就談不上。

從品德培養的角度看，「致知格物，誠意正心」最終是歸結到「正心」。古人對此瞭然於懷。

明太祖朱元璋是個很有見地的皇帝，他在談到子女教育問題時說：「教子之法最重要的是正心，心能正了，什麼事情都能辦好，心若不能正，各種私欲就會乘虛而入，那就很要不得了。」

以剛毅正直、不畏權貴聞名的明代人楊繼盛，因上書揭露宰相嚴嵩擅權誤國而被害。他在獄中遺書兩個兒子說：「心爲一身之主，如樹之根，如果之蒂，最不可先壞了心。心中若是存天理，存公道，則行出來的都是好事，便是君子這邊的。心裏若存的是人欲，是私意，雖行好事也有始無終，雖欲外面做好人，也被人看破。你如根衰則樹枯，蒂壞則果落，故吾要你休把心壞了。」

「正心」，用今天的話說，叫作端正思想。但在古人，自有他們的理解和表達。宋代司馬光就有：「治心」的說法。他說：「學者，所以求治心也。學雖多，而心不治，安以學爲？」這段話是講學習的目的在於「治心」，提高自身的內在素養（包括道德和學問），如果只是爲學而學，不從根本上提高自

己，那麼學得再多也沒有用處。除了以學「治心」外，還有一種「治心」的形式，即「回心」。所謂「回心」，就是「去惡而從善，舍非而從是。」司馬氏所說的兩點，實際上就是「正心」，只是前者是對一般爲學者而言，後者則對犯有過失者加以指點。

古人認爲，讀書學習可以使人明理，了解「至善」之所在。從而改變人的氣質，使人高尚起來。關於這種思想，古代家教中有明顯的反映。

明人吳麟徵在《家誠要言》中說：「多讀書則氣清，氣清則神正，神正則吉祥出焉，自天佑之；讀書少則身暇，身暇則邪間，邪間則過惡作焉，憂患及之。」他的意思是：多讀書可以使人氣質清純，心神端正，德操也會高尚，避免過失和邪惡，隨之而來的是吉利和祥瑞，這種人能得到老天的庇佑。而讀書少的人則耽於閒暇，這時邪念就易乘隙而入，導至過失，甚至走向邪惡，憂患也就跟着來了。所以他主張子孫後輩「打掃光明一片地，囊貯古今，研究經史」。意即去除蕪雜，潔淨心地，以容貯古今學問，研究經籍史書。吳氏諄諄告誡：「人心止此方寸之地，要當光明洞達，直走向上一路，若有齷齪卑鄙襟懷，則一生德器壞矣。」

在此以前，南宋大詩人陸游在他的《五更讀書示子》詩中寫道：「近村遠村鷄續鳴，大星已高天未明。牀頭瓦檠燈煜爚，老夫凍坐書縱橫。暮年於書更多味，眼底明明見莘渭。但令病骨尚枝梧，半盞殘膏未爲費。吾兒雖黷素業存，頗能伴翁飽菜根。萬鍾一品不足論，時來出手蘇元元。」陸游暮年，壯心不已，依舊手不釋卷，寒夜苦讀至天明。他以自己這種學習精神示教於兒子。告知他們，作父親的嗜學如此，是因爲從書中看到了伊尹、呂望二位大賢的德才與他們的事業，傾心嚮往。他認爲自己的孩子雖然愚直，但靠着薄薄的家產，尚可供他們學習，孩子們也能隨老父儉樸度日，故可望修德立業。末了，這位大詩人既勉勵兒子又抒發懷抱，說：高官厚祿不足掛齒，而應心存天下，有了機會就要幹一番拯救百姓的事業。

對於子女而言，美德的養成有一個學習和漸就的過程，這當中有他們自己對事物的理解和思考。在家庭教育的環節上，父母需要通過環境中所能接觸到的各種事物和現象，根據自己的人生經驗，隨時向子女講明事理，或以適當的行爲方式作出示範，以使子女逐漸明辨是非，確立良好的品性。

漢代名將馬援遠征交趾（郡名，轄境在今越南北部）時，聞知侄子馬嚴、

馬敦譏議他人，交友輕率，遂不顧軍務煩勞，特地寄書，嚴肅又誠懇地告誡侄子們說：「好議論他人長短，隨便評說政令的對、錯，這是我所痛恨的事，寧可死去也不願意子孫有這種行爲。」他要求侄子們向一位名叫龍伯高的人學習，因爲龍氏爲人厚道，行事周密謹慎、語言適當，對人有禮，生活儉樸而有節制，廉潔奉公而有威望。他反對侄子們效法一位名叫杜季良的人，儘管這個人豪俠好義，心存他人，分擔朋友的憂愁，把朋友的歡樂當作自己的歡樂，能辨清濁，朋友衆多。爲了使侄子們明白個中原因，馬援解釋說：「學龍伯高不成，多少還是個恭謹整飭之人。就像常言說：『刻天鵝不成還像隻鴨』；仿杜季良不成，就難免陷爲輕薄子弟，那就叫『畫猛虎不成反像條狗』。」

馬援的高明之處在於他嚴厲地批評了侄子卻顧及了對方的自尊心。他不直指某人和具體差錯，只表明對不良現象決不容忍的態度，他把這種態度的重申比作母親對出嫁女兒的叮囑。這樣，批評雖嚴卻易爲人接受。在侄子欽慕的和自己推崇的人之間，馬援並不輕率否定前者，而是擺出兩人的優點，作出比較，並自己的人生經驗衡量，談出傾向，做到以理服人，促使侄輩「去惡而從善，舍非而從是」。

在對待後輩過失，糾偏正心的問題之上，馬援是採用了喻之以理，動之以情，薦之以榜樣的辦法。而明代人彭澤的父親則是另一種作法。彭澤在出任徽州知府時，爲討得父親歡心，令人做了幾十件工藝精美的漆器，專門派一員小吏送回蘭州老家。不料其父見了大怒，說：「吾以澤居官，爲天子愛民節財，乃今數月未聞善政，而以官物來家，即貧不可荆布遺家耶！」將這些漆器全部燒掉，步行數千里來到徽州。彭澤大驚出迎，其父入堂後，杖擊彭澤，揚長而去。彭澤萬分慚愧，自此以後，廉潔奉公，節用愛民，實行善政，受到百姓頌揚。

其實，在家庭教育中，所謂「正心」，說到底，就是把是非善惡的觀念教給子女，使他們具備識別能力，並能指導自己的行動，摒惡留善，去非存是，這種教育既有糾錯的一面，更多的卻是正面的引導。

宋朝有位名叫劉安世的人，是司馬光的門生，爲人正直。司馬光任宰相時，推薦他當秘書省正字。後又被任命爲諫議大夫。他在接到任命時心情很矛盾，因爲擔任這項職務要經常冒觸犯皇帝和權貴的風險，極有可能遭禍甚至被殺，還要拖累老母、家庭，而他又摯愛母親，不願帶給她痛苦，所以想借故推